

鄒平鄉刊書店出版

弁言

本書係輯吾師梁漱溟先生最近二年來比較重要的文字或言論而成。澂承命輯錄，既將付印，特弁數言。

一、先生前年有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刊行，大抵從村治月刊所發表者輯錄而成，故一名『村治論文集』。今本書所輯多曾在鄉村建設旬刊發表，故定名為『鄉村建設論文集』。

二、先生最近二年來手寫文字或講演紀錄，蓋皆不止此數。顧講演雖多而紀錄之經先生訂正者則甚少，或且未經寓目，實不宜任其傳播；故茲錄不過三篇，其餘概未採入。先生手寫文字亦有一時應付之作，無關宏旨者；茲承先生意，并行省略。於是乃只得此數也。

三、本書輯錄各篇不以時間先後爲序，而俾其內容性質相近者相聯，庶便省覽。讀者試檢之，蓋可以見也。

四、『中國之地方自治問題』一稿，乃先生於二十一年十二月出席第二次內政會議前所講於鄉村建設研究院者；當時澂爲筆記，曾呈先生閱過，而未及改訂。茲特請於先生，附印書末；其中辭意或未盡當，由筆者負其責。

——二十三年六月綏遠李澂誌於鄒平——

跋記

激既輯吾師近著爲鄉村建設論文集，出版匝月輒罄。茲值再版，復以左列四篇輯入：一、『自述』一篇，係先生於本年一月初旬爲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短期講習會所講，而由朱秉國君記錄之講演稿。二、『人類社會建設應有的原則』一篇，係先生手寫舊稿，爲『鄉村建設根本理論之研究』中之一節，曾講於研究院。三、『在中國從前歷史上有無鄉村自治』一篇，爲『鄉村自治組織』中之一節，曾講於研究院。以上後兩稿俱缺而不完。四、『我的一段心事』一篇，係先生於本年八月十三日兼代山東鄒平縣長時，對鄉學輔導員鄉理事所講，而由同人紀錄者。此稿雖未經先生訂正，固亦得請於先生，并附印於後。

——二十三年十一月李激——

鄉村建設論文集

(第一集)

目次

(頁碼)

(一) 自述·····	一
(二) 請大家研究社會問題·····	三七
(三) 解決中國經濟問題之特殊困難·····	四四
(四) 中國此刻尙不到有憲法成功的時候·····	四七
(五) 由鄉村建設以復興民族案(附同題各案)·····	五二
(六) 建設與崩潰·····	六四
(七) 一封公開的信·····	六八
(八) 鄉村建設是什麼?·····	七三
(九) 人類社會建設應有的原則·····	七八
(十) 鄉村建設理論提綱·····	八三
(十一) 在中國從前歷史上有無鄉村自治?·····	九三
(十二) 縣政建設實驗區實驗計劃緒言·····	一〇〇
(十三) 鄒平縣縣政建設實驗區計劃摘錄·····	一〇二

(十四)村學鄉學須知……………一〇九

(十五)鄉農學校的辦法及其意義……………一三〇

(十六)社會本位的教育系統草案……………一四一

附

一、中國之地方自治問題……………一六一

二、我的一段心事……………一二二

自述

——二十三年一月爲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講習會講演——

日昨曾說明本院開辦講習會之意義，並非欲在此短時期內傳授諸君以知識技能，趕着應用，一如普通之速成班；本院的意旨是因爲吾們皆身在問題中，又生於問題最嚴重之中國，吾們聚合一處，商討吾們的問題，找出路子，解決煩悶。

今日所講之內容將先說明我自己，在說明我自己時最可使諸君明白上面「解決煩悶」之意。今日所講與日昨所講實相連貫。諸君如已經看過我所發表的文字，其中有兩篇皆是說明我自己的。其一卽「如何成功今天的我」，見卅後文錄（商務印書館發行）。此文係民國十七年在廣州中山大學的講稿，在此文中我曾說明，外間對於個人，往往有許多不同之猜測，以爲我爲一學問家、哲學家、國學家或其他專家，仿佛看我爲學問中人；其實我並無學問。我省思再四我自己認識我，我實在不是學問中人，我可算是「問題中人」。如果有人問我，我現在何以有一點關於哲學、佛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各方面的知識？何以在社會中的有此地位？我的答復，乃是由於問題逼出的來。我當初並無意於求某一方面的學問，或者是哲學，或者是佛學，乃至於政治學、經濟學等等，而結果則都知道一點，其所以致此者，問題逼之使然也。當初我亦無意於社會中如何做那種事業，成就一種地位，而結果能做點事業，有點地

位；其故無他，亦問題逼之使然也（看下文自明）。

最近我有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的出版，此書係彙集我在村治月刊各期內所發表之論文而成。其中第一篇「主編本刊之自白」一文也是表白我自己，說明我自己所以成爲今日的我，所以主編村治月刊的原因，無一非問題逼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諸君如已看過這兩篇文字，皆可以了解我；但我在今日講辭中仍願爲諸君說明我自己。

因爲本院招收講習會會員時，曾囑諸君先寫一篇「自述」，俾本院同人對於諸君有一了解；以故我亦應爲諸君敘述我自己，使諸君對於我亦得以了解。我之所謂今日所講與日昨所講彼此有關係者，意卽在斯。以下且先說明我自己。

我之籍貫係廣西桂林，我之祖父生於桂林，先父與我則皆生於北京，先母爲雲南籍。我生於清光緒十九年，今年爲四十一歲。我生後身體極弱，較之於尋常兒童皆有不及。六歲時，頭目時刻暈眩，有時頓感地動天搖，自己無力支持；醫生曾語先父，此子恐難永年，殊可憂也。

八歲時，入北京中西小學堂，此處係北京最先設立之小學堂。入中西小學堂後，卽讀西文 ABC……與教科書等；所可惜者，西文程度迄未見好耳。此中最可注意者，卽我從小時候卽讀教科書，未嘗致力於中國學問，讀四書、五經等等。大約凡與我年相若之友朋，類皆讀過四書，而我則始終未之讀也。我之所以從小時候卽入學堂讀教科書，實因先父之思想趨

向「維新」，不欲我諷誦古籍也。

小學未屆畢業，即入順天中學（北京原爲順天府），十九歲時畢中學業。我之受正式教育的日子，即止於此。此後即未能再受正軌的教育，入較高的學校求學。因此之故，諸君或可明白我不夠講學問，亦無學問可講。良以講學問必須具有相當的條件與工具；講中國學問，非知道文字學（即小學）經學等不可；講西洋學問，西文不具備相當之根基；亦實不可能。茲二者我皆未嘗下過工夫，我又何能講中國學問或西洋學問？我當初所受的教育，如此淺薄，講學問的工具，如此不夠用，而一般人視我爲學問家，目我爲學問中人，寧不可怪？然我對於種種學問又似乎都知道者，實即上文所說，問題逼之使然也。我所知者，實是於不知不覺中摸索得來，當初自己並未能料到，乃是誤打誤撞而來，自己實未嘗想到學問究屬何事也。

某年，應清華大學之請，作短期講課。當時梁任公先生介紹我說，「梁先生（指我）家學淵源」；我即刻聲明，我實在缺乏學問，更談不到家學淵源。但從別一方面言之，我之一切，受先父所影響者，却又很大。所謂淵源，無寧謂之爲性情脾氣淵源之爲愈也。因此之故，在未說明我自己之前，又不得不先說明先父之爲人。

先父爲人，天資並不算高，只是太認真，太真實。此點由其思想上可以看出。先父有個己的思想。本來，爲人子者，似不該用批評的口脛，縱論其父若祖；但欲諸君了解我，與了解先君之爲人能清楚計，又不得不爾。徵實言之，先父之思想，原是淺薄，但他有思想。

所謂有思想，即是肯認真，以爲這樣是對，那樣則是不對。他有主見（即是思想），所以有主見，因爲他肯認真。徒以天資不高，雖有主見，而所見者甚單簡耳。

最可怪者，先父之思想，實與西洋思想相近。他實在是一個功利主義者。他時時持有一個標準，而依此標準評論一切。他所持有之標準，即是「有用處」三字。他批評世間一切事，有用處即是好，無用處乃是不好，此點彷彿與詹姆士 James 杜威 John Dewey 等之思想相近。所謂實用主義。他自己雖也曾讀書中舉，但他最看不起讀書人，最看不起做文章的人；因爲讀書人不中用，因爲文章亦不中用。依之，讀書人要不得，文章亦不必要。他最慣看人做詩詞寫文章，他時常歎息痛恨中國國事爲文人所誤；一個人如果讀書中舉，便快成無用之人，如再中進士點翰林，則更將變成廢物而無用。

先父思想之所以如此者，不外下列數種原因：其一、由於他的天資不高，所見未免着重事物，稍涉虛渺處即不能知之，於是所見者皆甚單簡。其二、由於當時之社會國家情勢，予先父以莫大之刺激與影響。彼時正在曾胡用兵之後，開出崇尚「事功」的風氣；與在乾隆、嘉慶時，中國的風氣，正是講漢學者不同。訖於光緒中葉，國際侵略日加；甲午一戰，關係尤大。在在使先父感傷國勢之危殆，問題之嚴重，不能自己。同時先父又看到西洋各國之強盛，事事有辦法、有功效、有用處，而反觀中國，則一無辦法，事不見功效，人又無用處。先父之傾向於維新者，實即其人感情真摯，關切國事，及其一種實用主義哲學，主張務實不

務虛之故。惟其如此，故不令我讀經書而使我入學堂也。

以下須轉滙說明我自己。我自己的性情與脾氣，頗多相似於先父之處。先父天資不高，我自己亦甚笨。我越幼小時越笨，此點諸君或不肯置信，而實則我自己反省時確確如此也。在我說明我自己時，彷彿我站在旁邊看我的爲人，全是客觀的態度；用好字樣講自己的好處時並非誇大，用不好的字樣亦不是謙虛，此點最盼諸君能加留心。

我爲人的真摯，有似於先父。在事情上認真，對待人也真誠。卽先父之視我，亦自謂我與他相似；當我十七歲時，先父曾字我曰「肖吾」，於此可見。在今日我自己反省時，我感覺到我的所以如此者，無一不是由於我的性情脾氣所造成。諸君能了然於此後，請進而言事實。

吾人幼小時，心胸中空空洞洞，勢不免於先入爲主。況加我之性情脾氣既同於先父。於是先父的思想，乃成爲我的思想。先父爲一實用主義者，我亦隨之而成爲一實用主義者。我入中學時十四歲，國文教師教我的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我最不高興；國文講義，我向例不看，尤其不喜歡空洞的議論，如蘇東坡之萬言書。至若莊子上的文字，更叫我頭痛痛恨。因爲莊子上的文字，富有哲學意味，玄妙極頂；類如「此一是非，彼一是非，是是非非，非非是是」，實在是故示玄妙，完全騙人誤人的東西。所有莊子、老子一類書，我全不以爲然。其他如古文、詞章、文選派之六朝文章，我無一不厭惡。我從來沒有在國文上，下過功夫。由

此種至狹隘之見解中，亦可以看到我之愚笨爲何如，我之認真爲何如。此種狹隘之見解，二十餘歲以後，才漸次解放。我所有的這半生中，變化極多，許多事從前與日後完全不同樣，儼若兩人。這在我當初實不及料。在今日我反省過去，我却有以下之「四不料」。其第一不料，即當初最反對高立最嫌厭哲學，却不料以後反到大學中去講哲學，致爲人目之爲哲學家也。

我的至狹隘之見解，幾經變化才得逐漸解放。第一次發生變化時，即在順天中學。同學中有郭君其人者，年長於我兩歲，在校中則較我低一班。此君天資極高，彼時不過十八九歲，專看佛經、易經、老子、莊子等書，因爲我們不同班，不多往來。某日，在校內假山上遇見，乃相偕攀談，我述我的思想，我說我願爲社會爲國家做一番事業，慷慨陳詞，自命不凡。郭君笑而不以爲然。彼所以語我者，認爲我即是想做事業，自己必須先有身心的修養。我語之，我亦看理學宗傳、陽明語錄等書。彼又語我，吾人必先將世間之得失成敗利害等等，看來無動於中，由此方可有大無畏之精神，不因稍感挫折而遽爾心灰意懶；如果以我如此之拘謹、狹隘、呆板，專講有用之學，實不能成大事。必須先明白了很高之學問，日後才有辦法。郭君一席談話，打動了我的心肝，因爲這些話無一不是就我當時的思想而加誘導的。自此之後，我不時與他親近，不時相與往還。他最愛講譚嗣同之「仁學」。郭君每爲我講時，我即記錄其說話；我不敢認他爲同學，乃尊之爲郭師。每日課後即前往就教，他講我聽，且一

一記之。在紀錄之簿本上題名爲「郭師語錄」。由此亦不難看出我之認真與愚笨。但好處即在於愚笨與認真。因爲愚笨，思想的過程，不能超過他人先走一步，必須走一步後，撞着釘子，乃又反省、轉移、變化；「每一步皆是踏實不空，以後又繼續追求，向前走去，追求時撞着釘子，乃又反省、轉移、變化」。以故我此生時時在變化中。因爲有變化，先前狹隘之見解乃得漸次解放，不敢謂佛老爲絕無道理矣。以上可說是第一次的解放。

第二次的變化，亦即是第二次之解放，乃是從人生問題煩悶中發生厭世出世之思想而轉變了我之爲人。關於我的所以發生厭世思想種種，說來話長，非在此短時期內所可言之無遺。卅前文錄（商務印書館發行）有「究元決疑論」一文可以參看。此篇文字係一出世主義之哲學，今日不必在此再贅言之。原其所以然，蓋由三層原故：一、感情真摯易多感傷感觸，佛家所謂煩惱重。二、事功派的誇大心理易反動而趨消極。三、用思太過，不知自休，以致神經衰弱而神經過敏。但在主觀上則自有一套理論，持之甚堅且確。因爲發生厭世思想，則根本否認人生，更不再講實利。於是以前之狹隘實利主義乃大解放矣。

我的看佛學書，是自己已經先有了與佛家相近之思想而後才去看佛學書。我看任何書都是如此，必是自己先已經有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而後再參考別人的意見。從未因讀書而讀書。看西洋哲學書亦復如此。友人張崧年（申府）先生以我之思想與叔本華之思想相近，於是乃將叔本華之著作與相關之別人著作介紹給我。這是我看西洋哲學書的起緣。總之，我自己必先

有問題與思想然後才去看書。如此展轉，如此過渡，如此變化，乃成爲今日的我，乃有今日的思想。

講到這裏，可以結束我今日的說話。關於我的人生思想之轉變或是哲學的變化，可分爲三期。第一時期爲實用主義時期，從十四五歲起至十九歲止，以受先父之影響爲多。第二時期即爲上文所講之出世思想歸入於佛家，從二十歲起至二十八歲止。在此時期中一心想出家做和尚。第三時期由佛家思想轉入於儒家思想，從二十八九以後，即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之際。在此三個時期中，令人感覺奇巧者，即是第一個時期可謂爲西洋的思想，第二個時期可謂爲印度的思想，第三個時期可謂爲中國的思想。仿佛世界文化中三大流派，皆在我腦海中巡迴了一次。

我本來無學問，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來，實來自我的問題，來自我的認真。因爲我能認真，乃會有人生問題，乃會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學。不單是有哲學，因爲我不是爲哲學而哲學。在我的出世思想必要出家做和尚而後已，當初我的思想是從實在的問題中來，結果必回歸於實在的行動中去。譬之佛家的實在處所，即在不吃葷、不結婚出家做和尚，我當時即要如此做去。我二十餘年茹素習慣即由彼時養成。我中學畢業之後原須升學、求學問，但當時的我，一心想做和尚則又何用升學爲？

我之所以能如此者，先父之成就我極大。因先父從來不干涉我、勉強我；從未要我準備

功課督促我升學，此實常人所難及也。先父甚不喜歡佛學，但他不禁止我看佛經；先父希望我升學，但他未嘗明白語我要升學；先父希望我結婚，但他從未一言及我應當早日結婚。而在我自己，亦未嘗不明瞭先父之意旨，希望我升學，希望我不要研究佛學，希望我結婚。當民國七年，先父以感傷國家的多故，痛心社會的墜落，早懷自殺之念。廢歷十月初十日，係其生辰，在他六十歲生辰前三日，從容留下許多信件，即行自盡。此中種種，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桂林梁先生遺書可以參看。普通人一值晚年，類皆希望有後代，能見到後代，先父當亦如此。在他懷下自殺之念時，家兄結婚已十年，未嘗有子，此在旁人必督促我結婚，而先父則始終未肯言之。我每念及此，未嘗不眷眷於先父之不强逼我，其玉成我之重大也。

在我過去之半生中，從最初迄於今日，我皆有我的意志，由我自己去撞釘子，發生轉變，自己摸出路子來；如果有人稍加干涉，則步驟必亂。先父不强逼我升學、結婚，一任其自然，實所以成就我；給我以絕對的自由，讓我上前追求、轉移，用自己的力。否則今日的我，必非如此。我又推究先父對待我所以如此者，蓋其心目中以為此子現在要這樣，又要那樣，事雖荒謬，而動機則為向上心的驅使，處處是要好，並非自甘淪入下流；所行所為心中經過揣量審決，並非一味亂來。現在雖不能『對』，在將來，他總會有改轉『對』的一日。如果我是趨於下流，則亦必加以干涉與督責了。實則彼時先父如果干涉我，我亦不受，要我聽他的說話，我亦是不聽；因我意志太强。但我推究先父的心理，他確是了解我，而信任我。

(二十三年一月三日講)

今日將繼續日昨之講詞，仍說明我自己的爲人。日昨曾提及我二十歲起，傾向出世主義，意志異常堅決，而先父不干涉我，一任我之自然；雖然他心目中不願我如此。先父在世，未能目覩我之轉變，且亦未知我日後果有轉變。在先父辭世後二三年間，我即轉變，由佛家思想轉變到儒家思想。關於轉變種種，前因後果，在此有限之時間內，實無法詳細言之。語其時期，則在民國九年至十年春間。此次轉變之深刻，前後絕不相同。我編完先父遺書（即桂林梁先生遺書商務印書館有版本）之後，曾有「思親記」一文之作；在此文中有下列一段說話：

『溟自元年以來，謬慕釋氏。語及人生大道，必歸宗天竺；策數世間治理，則矜尙遠西。於祖國風教大原，先民德禮之化，顧不知留意；尤傷公之心。讀公晚年筆墨，暨辭世遺言，恒覺有抑鬱孤懷，一世不得同心，無可訴語者；以漱溟日夕趨侍於公，曷嘗得公歡，而卒味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嗚呼！痛已！兒子之罪，罪彌天地已！逮後始復有痛於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忘輕率言之，無有一當。則公之見背既三年矣，顧可贖哉？顧可贖哉？』

由上列一段說話中，亦可看出我轉變之概略。先父辭世後三年，我即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之發表，以闡明中國文化之深微。不知我者恒以爲我之喜歡講中國文化，係受先父之影響，實則先父在日，我最不留心中國文化，此在「語及人生大道，必歸宗天竺；策數世間

治理，則矜尙遠西」數言中，以及上文所講種種，不難知之也。

我轉變之後，即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在此書最後所下之結論，我認爲人類的最近的未來，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書中贊揚孔子闡明儒家思想之處極多。諸君聆我之講話到此際時，至須注意，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之所以產生，實係問題逼出來也。

民國六年，我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子民先生之邀入北大教書，其時校內文科教授有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高一涵、陶孟和諸先生。陳先生任文科學長。茲數先生即彼時所謂新青年派，皆是崇尙西洋思想，反對東方文化的。我日夕與之相處，無時不感覺壓迫之嚴重（我對於儒家思想之了解係先前之事，而思想轉變由佛家而儒家則在此時之後也）。我應聘之前，即與蔡陳兩先生說明，我此番到北大，實懷抱一種意志一種願望，即是爲孔子爲釋迦說個明白，出一口氣（出氣二字或不甚妥當）。其時文科教授中諸先生有講程朱老莊之學者，更有其他教員亦是講中國的學問。新青年雜誌之批評中國文化，異常鋒利動聽，在他們不感覺到痛苦：彷彿認爲各人講各人的話，彼此實不必相干；仿佛自己被敵人打傷一槍，猶視若無事也。而我則十二分的感覺到壓迫之嚴重，問題之不可忽略，非求出一解決的道路不可。在我未肯定我的答案以前我一時可以緘默不言；但必是時時去找路子，探求答案，不稍甘一如他人之漠不關心也。

民國九年蔡校長出國赴歐洲考察，北大同人爲之餞行。席間講話，多半認爲蔡先生此行，於東西洋文化之溝通關係頗大；蔡先生可以將中國文化中之優越者介紹給西方去，將西

方文化之優越者帶回到中國來。在各人講話完了之後，我即提出質問。我說：諸先生今日的說話，似頗耐聽；但不知東方文化中有什麼可以介紹給西方去？諸先生如不能確實言之，則今日一席話，實有類似於普通饅行之客套語，甚少意義與價值。

由上以言，可見我凡是成爲問題的，在我心目中從來不肯忽略過去。推究其故，還是不外我肯認真，不能不用心思，不能不加以考究，決不容許我自己欺瞞自己。如果我們說不出某一個問題中的道理，即是我們沒有道理；我們看到別人家是好或是對，則別人家即是好或是對，這點不能有遲疑的。我往常恆以旁人之忽略對方的意見，對方的見地之可怪。因爲每一個人都會有他自己的見地，即便爲荒謬的見地或意見，亦必有其來源。我們須認清了解對方（即是與我不同者）的見地，明白對方的意見，是一件極重要之事；而普通人往往不能注意及此，甯不可怪？諸君中如曾注意閱讀我業經發表之文字，可以看出我寫文章的方法，多半爲辯論體裁，先設身處地將別人的意見，敘述得有條不紊，清清楚楚，而後再轉折說出我的意見。我已往凡是批評西洋的民主政治以及批評俄國現行的制度，無一不是先把人家的意見，研究過透澈，說得明明白白；然後再轉折到我的批評，批評其不通，批評其不行。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我對於西洋文化的優點先闡明無遺，東方的不行處說個淋漓痛快；然後歸折到東方文化勝過西洋文化之處。我原來並不曾想到著書立說、談學問，只是心目中有問題，在各個問題中都曾用過心思，無妨將用過的心思說給大家聽；因爲我的問題，實即是